



高金智库要报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中国金融研究院

总 095 期
2025 年 11 月

美国 2025 年上半年财政部政策动态跟踪和评估

【内容提要】美国财政部 2025 年上半年在政府换届背景下，职能重心从落实产业政策转向减税和去监管，决策模式从部门自主转向执行白宫议程。耶伦时期以落实《通胀削减法案》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让位于贝森特的执行主导议程：对内聚焦减税和去监管，对外配合贸易战略开展大量双边协调。然而，

财政部高效的政治执行力以财政稳健和金融稳定等部门职能的退守为代价：减税议程约束了未来收入空间，债务管理仍然依赖上限谈判，而关税议程对美元信誉和价值的冲击逐渐显现，海外官方减持美债已渐成趋势。虽然年中债务上限危机暂时缓解，但上半年陆续落地的减收扩支类法案将使美国财政稳健和债务隐忧持续深化。

一、美国财长换届带来的财政部职能重心和决策特点调整

财政部的部门职能不仅包括宏观调控（通过扩大政府开支、调节税收杠杆、执行产业政策等，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等政策目标），也包括维护金融稳定（作为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的牵头部门），具体体现在债务管理、金融监管协调和对外金融制裁等方面。这些虽然都是财政部的法定职能，但在不同政府时期，部门功能定位和职能重心会随着总统议程的变化而调整。

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时期的财政部拥有更独立的部门裁量权，不仅因为拜登政府为各联邦职能部门留有较大的自主决策空间，也因为耶伦本身作为美联储前主席和学者型财长，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金融监管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独立的判断，她也是“现代供给侧经济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这也使得产业政策成为财政部核心的部门议程。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上任后，财政部更多

以落实白宫议程为优先事项。一方面反映了特朗普政府通过预算、资金调配、部门 KPI 制定等措施，推动主要联邦部门更好地落实白宫重要议程（总统行政令 EO 14215）。另一方面反映了贝森特本人资深的商界背景、宏观投资经验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行事风格，在执行总统议程方面不仅具有高效的执行力，也拥有战略思维且善用策略。贝森特在部门人员任用上则体现出较强的务实特征，不仅沿用特朗普前政府时期的职业事务官，也大量起用有国会背景的官员，甚至拜登政府的共和党技术官僚，以更好地协调需要两党协调的复杂立法（详见文后附录）。

许多经济学家将贝森特类比里根政府时期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①，后者以务实著称。与贝克类似，贝森特作为美国财长也充当了内部的“协调者”与外部的“战略家”的角色。对内，除了组建立法背景资深丰富的财政部班底，更好地落实总统削减开支议程的立法程序外，在处理跨部门关系和分歧方面，他以维持政府经济团队稳定为导向，一方面在特朗普公开抨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时私下进行调解，另一方面也通过媒体渠道剖析美联储独立性困境。在他看来，美联储独立性困境的根源不在于政治干预，而在于部门职能边界的模糊，只有约束权力边界，回归宏观调控的狭窄使命，

^① Shahin Vallée, “Why Scott Bessent could be Trump’s James Baker”, *Financial Times*, 2024-11, <https://www.ft.com/content/cf6fdede-2589-481a-87cb-1f7ce2b78dfa>

才能避免对部门独立性的反噬^①。对外，贝森特在落实和执行总统贸易和金融议程的过程中，也采用了贝克时期的策略（如在对外谈判中娴熟运用“大棒和胡萝卜”，构建可信赖联盟落实贸易议程），高度依赖国际协调来管理美国经济的贸易逆差失衡和外部经贸关系，相关特点也体现在财政部 2025 年上半年的政策动态中。

二、2025 年上半年美国财政部政策以宏观调控和对外协调职能为重

财政部本身的部门职能除宏观调控（扩大政府开支、调节税收杠杆、执行产业政策等）外，也包括维护金融稳定（作为 FSOC 的牵头部门），具体体现在债务管理、金融监管协调和对外金融制裁等方面。2025 年上半年因为涉及到政府换届，财政部出台的政策反映了两届政府不同的政策倾向。

（一）宏观调控重心伴随政府换届从产业政策转向减税议程

仅从 2025 年上半年来看，伴随着美国财长从耶伦转向贝森特，财政部宏观调控重点从产业政策的落实，转向减税议程的推进。这一转向在政策数量和议题分布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见图 1）

耶伦年初出台的政策主要以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扶持为主，反映了对《通胀削减法案》（IRA）的落实和延续，相关政策多达 8 项。贝森特上任后，美国产业政策仍在酝酿期，

^① Scott Bessent, “The Fed’s New ‘Gain-of-Function’ Monetary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pring 2025, https://www.international-economy.com/TIE_Sp25_Bessent.pdf

这也使得财政部 2025 年上半年暂停了《通胀削减法案》的实施，唯一出台的政策也是完善外商投资快速通道，以便美国在以 CFIUS 主导的对内投资审查框架下，探索非敏感、生产类资金入境的便利化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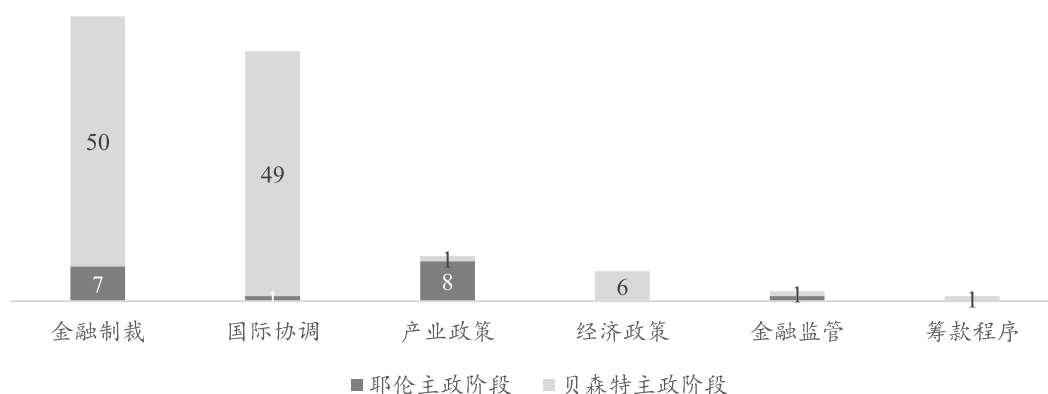


图 1 2025 年 1-6 月财政部发布政策的议题领域分布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贝森特主导下的财政部在 2025 年上半年的国内政策重点围绕特朗普的减税议程展开，具体包括召开“六大”官员会议^①（探讨总统减税议程的落地）、就国会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永久化和《大而美法案》等发布声明、就美国与全球的最低税规则协调提出方案等；贝森特就任后也推进了去监管方面的议程，特别是显著缩小了《企业透明度法案》的适用范围，为大量国内中小企业豁免了申报义务，该法案

^① 2025 年 3 月 25 日，美国财政部召集“六大”官员开会，出席人员包括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众议院多数党议长迈克·约翰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迈克·克拉波、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杰森·史密斯、总统助理兼立法事务办公室副幕僚长詹姆斯·布莱尔和总统副助理兼立法事务办公室主任詹姆斯·布雷德等。该小组讨论了总统削减税务的议程对美国工人和小企业的重要作用。

目前的适用和申报范围仅限为外资企业。此外，贝森特也废除了多项财税、监管和金融犯罪执法相关规则。

（二）债务上限僵局掣肘美财政部 2025 年上半年的债务管理

不同于国内经济政策，两届政府在债务管理立场上较为趋同，反映了财政部在债务上限僵局之下面临的困境。

美国财政部债务管理工作的重点在于寻求债务上限问题的解决。2025 年初，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再度触及债务上限，时任财长耶伦在 1 月中旬就债务上限问题向国会致函沟通任期结束前的安排，指出财政部将考虑实施“非常措施”^①，以便维持联邦政府的正常运转。贝森特上任后延续该方案，并预警国会“财政部资源将在 8 月耗尽，并敦促迅速采取行动以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债务上限压力对财政部的债务管理形成了较大的掣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非市场化债务发行空间大幅压缩。2025 年上半年，美国财政部依法启动“非常措施”，核心操作包括暂停政府金融投资、暂停发行州和地方政府系列债券等，这些直接导致非市场化债务存量在前两个季度分别减少 3106.8 亿美元和

^① “非常措施（extraordinary measure）”具体包括暂停为公务员退休和残疾基金（CSRDF）、邮政退休人员健康福利基金（PSRHBF）注入新资金并赎回部分投资；暂停对政府证券投资基金（G Fund）、汇率稳定基金（ESF）的再投资；暂停发行州和地方政府系列债券（SLGS）；与联邦融资银行展开债务互换交易等。（相关链接：Matthew Dickerson and William W. Beach, “Preparing for the Debt Limit: Projecting the 2025 X-Date”, Economic Policy Innovation Center, 2024-12-16. <https://epicforamerica.org/federal-budget/preparing-for-the-debt-limit-projecting-the-2025-x-date/>)

730.8 亿美元。财政部利用削减“非市场化债务”释放的有限借贷容量，用于发行市场化债务，以满足政府最低限度的支出需求（如支付利息、薪资和社会福利等）。

其次，财政部再融资能力严重受限。在常规阶段，财政部可以灵活增发短期国库券进行高效的债务资金管理，而债务上限压力下，短期工具因到期日近、需频繁续作而显得效率低下。对此，财政部在 2025 年上半年大幅压降短期国库券，为中长期债券发行腾挪有限空间，集中体现在用于借新还旧（主要为中长期债券）的再融资管理方面。2025 年二季度，财政部发行 1250 亿美元的国债用于偿还 898 亿美元的到期债务，所余新增融资（new cash）308 亿美元，高于上季度的 188 亿美元和 2024 年末季度的 86 亿美元，在私人净借款中的占比也从往常的个位数大幅上升至将近 50%，但这也反映出财政部再融资能力的大幅收缩——整个 2025 年上半年，财政部净融资规模仅为 4340 亿美元，远低于 2024 年下半年的 13820 亿美元。

再次，财政部现金缓冲大幅消耗。再融资能力受限迫使财政部不得不动用现金余额，为政府开支提供资金。财政部在美联储的账户（TGA）余额从年初的 7199 亿美元至 6 月末降至 3644 亿美元，特别是 2 月初至 4 月初期间锐减近 5000 亿美元，显示出债务上限压力对财政支付能力的实质冲击。

表 1 2025 年上半年美国财政部再融资调控和 TGA 余额走势概况（亿美元）

时间	财政部现金余额			私人净借款			私人部门融资		
	TGA	预估	缺口	预估	实际	缺口	发债	偿债	筹资
2024 年 12 月	7648	7000	648	5460	6200	740	1250	1164	86
2025 年 3 月	3602	8500	-4898	8150	3690	-4460	1250	1062	188
2025 年 6 月	3644	8500	-4856	5140	650	-4490	1250	942	308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可出售借款估算》《再融资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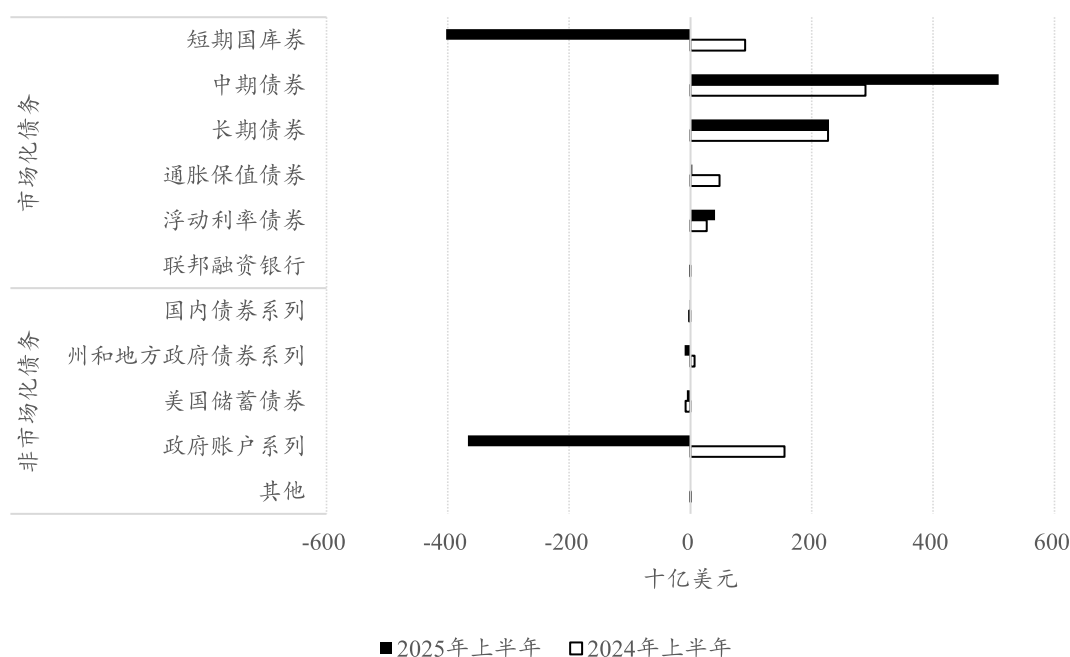


图 2 美国财政部债务余额分析：市场化债务和非市场化债务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政府债务月度声明（MSPD）

（三）在新政府贸易和军事议程下财政部对外重心明显调整

耶伦和贝森特主导下的财政部在对外政策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别，也反映出两届政府不同的对外经贸战略调整。

贝森特 1 月 28 日上任后，财政部国际协调的频率和广度显著提升，和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商务部等联邦部门在落地本届政府对外政策议程方面形成了较强的协同，并

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和议题导向特征。在东亚、东南亚和印太地区，贝森特的国际协调围绕贸易的主线展开，旨在纠正贸易失衡、减少贸易壁垒、增加对美投资、增强供应链安全合作和巩固美元体系等。不同于拜登政府致力于构建全新的印太经贸合作框架，贝森特则强调在现有区域多边框架（如亚开行）下，通过盟友发挥美国在地区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在欧洲地区，贝森特协调重点除降低对美国企业的非关税壁垒、加强保险监管合作外，还致力于推动欧洲地区军事自主，以降低美国境外军费开支。在中东地区，贝森特的协商重点在于反恐合作和构建反伊联盟，并致力于深化和战略盟友（如阿联酋、以色列、卡塔尔和约旦）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对中国方面，贝森特在延续耶伦时期财政部对产能过剩和不公平做法等关切之上，将禁毒列为核心议题，这也是上半年美国政府对华发动关税战的重要由头之一。在南美方面，贝森特重点支持阿根廷的经济改革并与墨西哥合作打击毒品资金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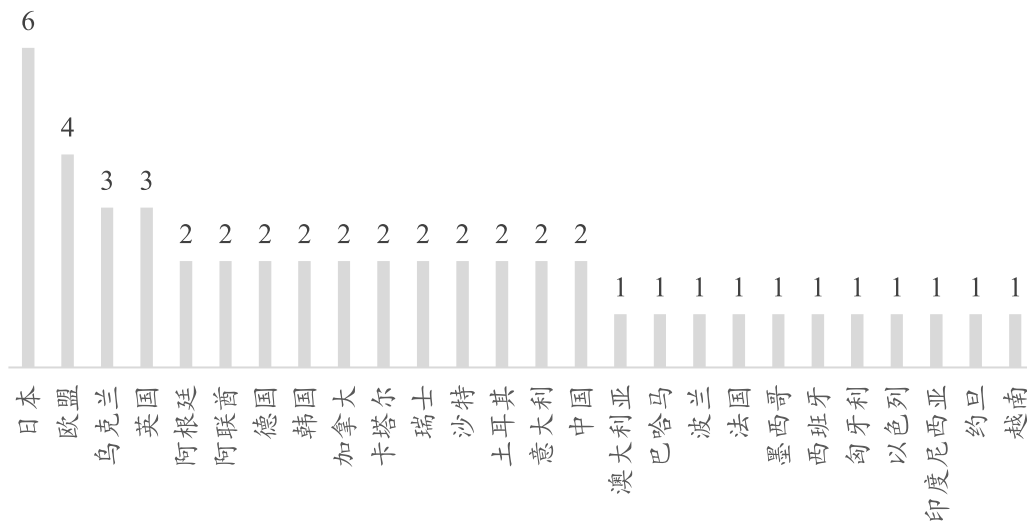


图3 2025年1-6月财政部与国际协调相关新闻中的国家分布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贝森特主政后，财政部对外金融制裁将伊朗列为核心目标，并延伸打击美国认定的资助网络（如中国、阿联酋等国实体）。同时，墨西哥也因非法移民、芬太尼贩毒等问题，成为财政部的重点制裁对象。相较耶伦主政时期的财政部，贝森特任下的财政部对俄制裁重点发生转移——虽然贝森特在会见土耳其、波兰等国政要时，强调了对俄罗斯的极限施压，但实际制裁力度明显弱于耶伦时期。耶伦在年初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如切断俄石油出口渠道，而贝森特时期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对俄制裁仅限于网络黑客和对当地反动武装网络的军用物资供给，并未掣肘俄罗斯经济命脉，制裁力度明显减弱，或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俄乌事件上的战略收缩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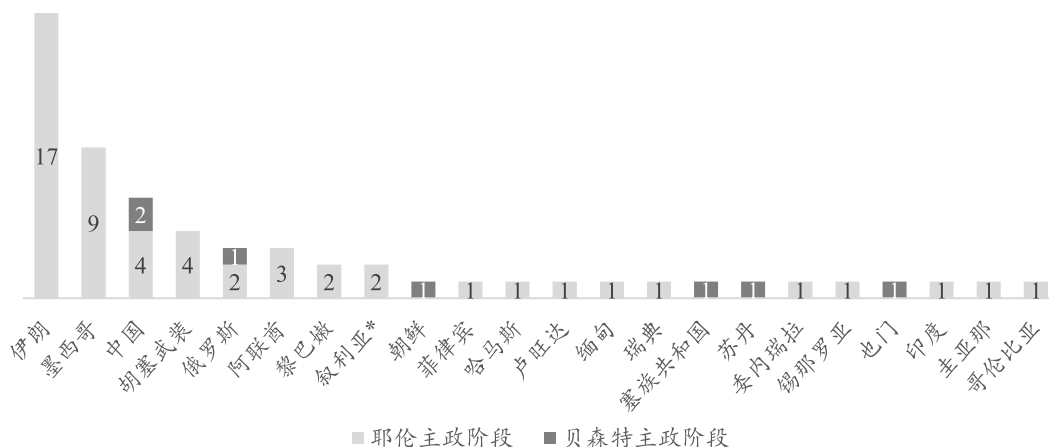


图4 2025年1-6月财政部与金融制裁相关新闻中的国家分布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注：美国针对叙利亚的金融制裁动向主要是取消制裁

三、美国 2025 年上半年财政赤字收窄、债务维持不变

(一) 美国财政赤字上半年显著收窄，走扩隐患仍存

2025 年上半年，美国财政收支差额为-6264.29 亿美元，较 2024 年上半年（-7633.28 亿美元）和 2023 年上半年（-12544.8 亿美元）明显收窄，虽然支出相较 2024 年上半年略有上升（3.6 万亿美元，增长 4.15%），但收入增长更明显（2.9 万亿美元，增长 10.50%）。从 2025 年上半年各月走势看，4 月财政收入增幅最大，并推动当月财政收支从赤字转为盈余（2584 亿美元），5 月收入大幅放缓而支出上升，财政收支再度走逆（-3160 亿美元），至 6 月，伴随收入回升和支出削减，美国财政收支实现小幅盈余（270 亿美元）。

美国财政赤字收窄主要得益于收入的超预期增长。关税收入在 2025 年二季度实现 110% 的超高增速，但也在企业端形成了“抢进口”效应，PMI 新订单、各类库存和供应商交

付在 2025 年上半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脉冲式上升，驱使财政主要进项增加明显。此外，利率中枢的相对下行对美国财政赤字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缓解了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压力（增速延续了自 2024 年初以来的大幅放缓势头），另一方面也侵蚀了美联储的资产利润，导致联储向财政部的上缴款项（“联邦政府资产收入”）减少，对收入形成一定的拖累。

美国财政支出端在 2025 年上半年反映了收缩倾向，这不仅是债务上限僵局下的被动约束，也反映了白宫推行降本增效的行政议程。譬如，EO 14217 要求减少政府开支、EO 14222 要求启动“政府效率部”授权终止或修改合同以节省开支、EO 14275 要求简化联邦采购法规，遵循“十（减）一（增）”原则，重点降低国防和经济安全支出。在上述要求下，可自由支配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成为压缩重点，特别是国防采购是财政开支削减的主要驱动；但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强制类支出（mandatory spending）需求仍相对刚性、规模不降反增。

总体而言，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压力虽在 2025 年上半年明显缓解，但更多是周期因素和行政要求共同作用的短期结果。收入端反映了“抢出口”的影响，改善并不可持续；支出端刚需仍相对明显。政府开支的削减和产业政策的放缓也对冲了减税议程对经济的提振，对收入端的长期稳健增长造成隐患。更重要的是，美国财政的深层次矛盾——收入端的

不稳定和支出端的长期承诺——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并且伴随着下半年债务上限困境解决、减收扩支相关法案落地等，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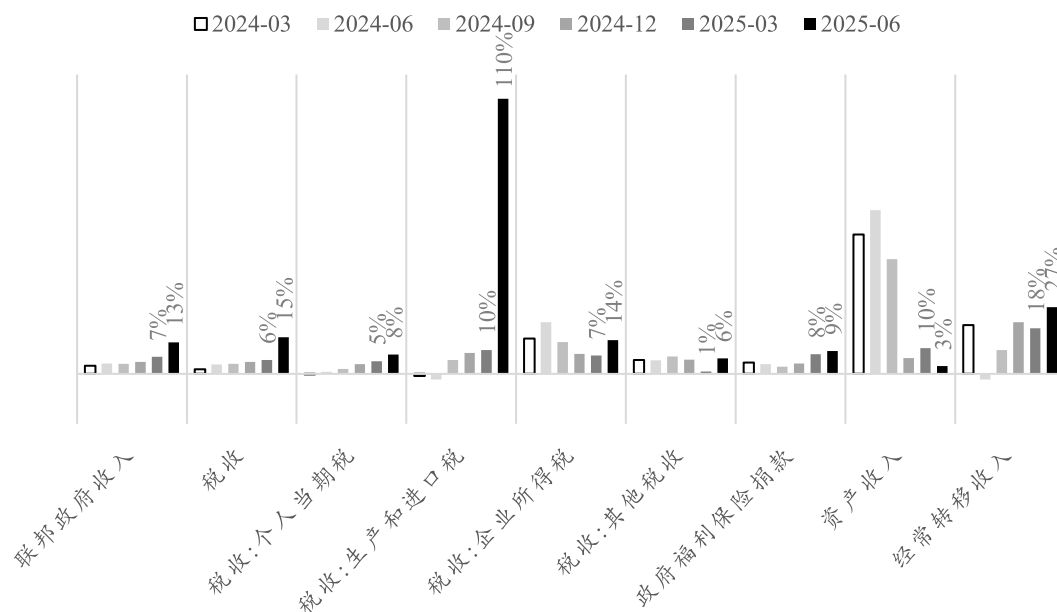


图 5 2025 年 1-6 月美国财政主要收入项目增速走势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Wind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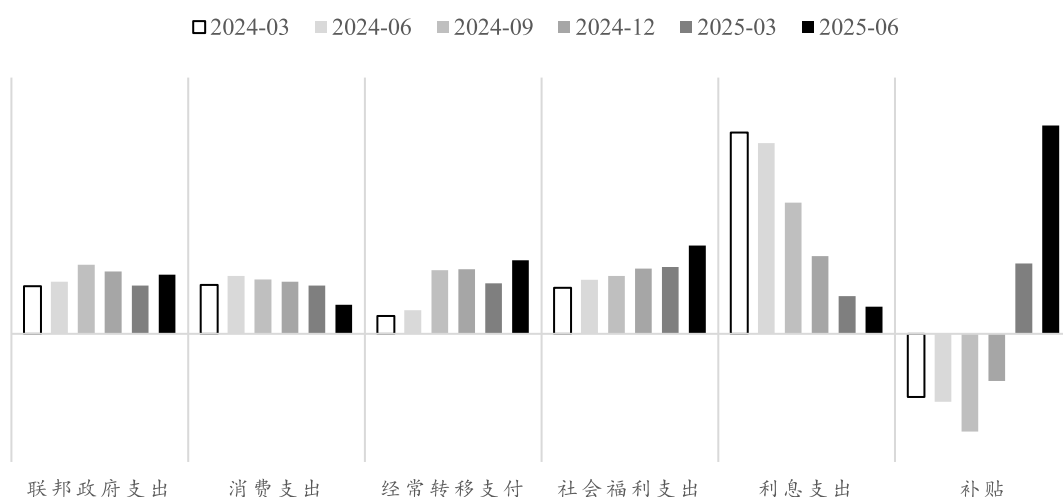


图 6 2025 年 1-6 月美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增速走势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Wind 数据库）

(二)2025 年上半年境外投资者减持美债的趋势化特征显现

2025 年上半年，联邦政府债务在债务上限约束下，始终维持在 36.2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债务从年初的 28.8 万亿美元，至年中略升至 28.9 万亿美元。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在 2025 年 4 月致美国财长的报告中提醒，债务上限困境不仅造成了财政部 TGA 余额的不稳定、干扰国库券发行节奏，还将引发美债市场混乱并冲击美国信用评级，增加技术违约风险，并对美元资产储备和美国国债需求造成潜在负面影响^①。

从数据上来看，债务上限困境叠加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全球（官方）投资者对美债的减持在 2025 年上半年已展示出趋势化的特征。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4 月，海外投资者长期美国证券（包括各类长期政府债券和企业股票）和短期美债净流入规模接近于零。5 月，在中美日内瓦谈判超预期下调关税、美国对盟友豁免关税等背景下，私人投资者需求明显反弹，但官方仍保持减持态势。6 月官方所持美债净额虽略有回升，但并未扭转海外整体需求下行态势。纽约联储代外国央行持有的美债规模也从解放日（4 月 2 日）的 2.929 万亿美元到年中（6 月末）仅为 2.876 万亿美元。与美国跨境债券资金走势相对应的是，全球美元储备份额在 2025 年从首季度的 57.79%，到二季度大幅回落至 56.32%，

^① “Report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rom the Treasury Borrowing Advisory Committee”, *US Treasury*, April 2025,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b0121>

这也是近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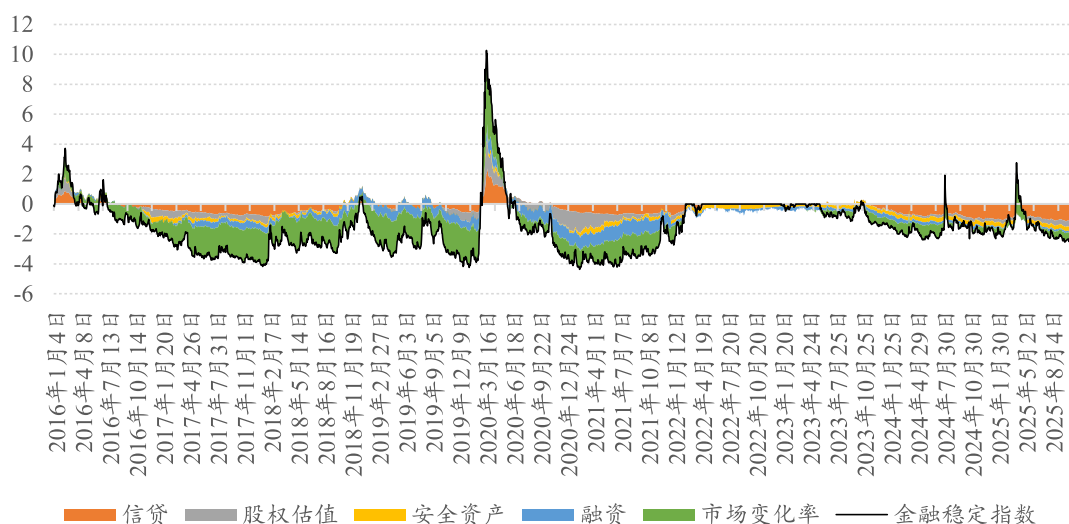
四、2025 年上半年美国财政政策评估

从落实总统议程来看，财政部在 2025 年上半年的成果显著。对外，财政部在推动贸易谈判方面取得高效进展。新政府上任后，财政部先后与 26 个贸易伙伴国展开双边会晤，为后续贸易议程的落地，特别是争取更有利的关税交换条件等方面，探索可行的实施依据。对内，贝森特在落实总统议程方面体现出务实特点。上半年，通过召开跨部门磋商，并在国会促成多项重要法案的通过，落地减税议程。同时，通过简化中小企业申报义务、废除多项财税和监管规则，兑现去监管承诺。然而，部分和财政部相关的总统行政令，譬如行政令 14196 要求设立的“美国主权财富基金”、行政令 14233 要求设立的“比特币战略储备”和“美国数字资产库存”等，因无先前经验、争议较高且投资回报不确定，均未体现在财政部上半年的政策动态中。或反映出财政部在落实总统议程时，面对有限的财政资源和现实约束，优先部署那些可行程度较高、见效快的核心议程，展现出较强的风险管控意识和务实主义倾向。

然而，财政部的政治执行力以传统部门职能的弱化为代价。2025 年上半年，在债务上限压力下，财政部提振经济能力有限（美国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整体趋降），财政赤字虽然明显收窄，但更多是严控支出的结果。在拨款法案难以形成

两党共识的背景下，财政管理仍然面临制度掣肘，依靠“临时拨款”维持政府运转变得越来越常态化。从财政稳健的角度看，减税议程的通过也埋下隐患，财政赤字长期化也导致贸易逆差问题更趋常态化。债务管理方面，财政部目前较为依赖上限谈判，缺乏主动管理工具。在年中债务上限抬升、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等背景下，美国财政和债务隐忧持续深化。

从跨部门协调看，财政部上半年虽然有力配合贸易部门展开大量双边会晤，但相关议程的推进对财政部自身的金融稳定职能造成了负面影响。虽然关税的提高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但该政策本身作为谈判的战略杠杆，难以作为财政赤字和债务管理的稳定工具，甚至加剧金融市场不稳定（4月初金融稳定指数上升至疫情后的最高值），并引发海外央行对美元储备的抛售和减持。“海湖庄园协议”提出的“与军事盟友进行债务绑定以巩固美元治外法权”的方案过于激进，在现实中难以落地，关税议程对美元信誉和价值的冲击缺乏可靠的政策缓冲。更进一步来看，真正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不是“强美元”，而是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弱美元”不仅无法解决美国贸易逆差，反而放大了价格扭曲信号；不仅导致美国自身“特里芬困境”更趋复杂化，也将加速透支美元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积累的制度信誉和网络效应，并对美元储备货币地位造成反噬。



美国金融研究办公室（OFR）金融稳定指数（FSI）及其分解走势

数据来源：OFR

*FSI 数值越大显示金融体系越不稳定

本期指导：刘晓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

本期执笔：杨悦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智库青年研究员

文字编辑：程冠男，高金智库编辑部

责任编辑：汪 洋，高金智库研究部

附录：新政府的财政部主要人事调整

除财长贝森特外，根据财政部 2025 年上半年官网公布的人事任命信息，还有 40 名官员被提名。比较重要的人事任命包括 2 名财政部副部长、1 名总法律顾问和 6 名助理部长（1 名弃选）等。关键职务的人事任命（提名）主要包括以下特点：

首先，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占据重要决策席位。有 8 位重要决策职位的官员都有在特朗普首任政府任职经历，这些官员覆盖的领域包括法律事务、金融监管、贸易发展、国家金融安全等，也有部分特朗普政府前官员也担任（副）财长顾问、立法、公共事务和金融监管等副职，以上任命有助于确保本届财政部决策与上届政府议程的紧密衔接和执行效率。

其次，金融监管和立法事务的核心决策人员具有国会资深背景。有 3 位有较为深厚的国会背景，涉及金融监管、立法等事务的核心决策，这些人员都曾是（特朗普前政府核心圈）共和党资深议员的政策顾问，甚至还参与特朗普首届政府重要法案的制定，如德里克·图伊勒（Derek Theurer）、卢克·佩蒂特（Luke Pettit）等。也有较多的立法事务、公共事务相关副职官员和法律顾问多有较为资深的国会背景，这也助于新政府推动更符合总统议程的法案。

再次，本届政府也任用拜登政府的共和党保守派技术官僚。特朗普在财政部金融监管最核心的决策职位，国内金融副部长的任命上，选用了曾在拜登政府任职的 FDIC 理事乔

纳森·麦克科南（Jonathan McKernan），此人在政策理念上虽然向特朗普政府差异化监管的金融议程靠拢，但作为技术官僚又同时秉持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倾向，该任命也有助于推动需要两党合作的复杂立法。

最后，本届政府核心决策职务的任命上较少有纯华尔街背景的人士。特朗普提名的本届财政部官员完全华尔街背景的不多，仅有政策规划部主任亨特·麦克马斯特（G. Hunter McMaster II）、金融市场助理部长詹森·特伦纳特（Jason De Sena Trennert）（后者因身体原因退选，前者代任该职）。其他任命的华尔街背景人士多以副职、顾问、行政等非核心决策职务为主，某种程度上也吸取了首届政府在核心职务（如美国财长姆努钦）上过多任用华尔街人士导致立法协调和对外谈判面临瓶颈的教训。

2025 年财政部新任命官员概况

新提名的人员	职务	背景
Jonathan Gould	货币监理署（OCC）署长	国会议员幕僚
Derek Theurer	立法事务助理部长、美国财长顾问	国会议员幕僚
Luke Pettit	金融机构助理部长（代国内财政副部长职）	国会议员幕僚
Jillian Wyant	白宫联络官	国会议员幕僚
Connor Dunn	立法事务助理副部长（银行和金融）	资深国会背景
Mason Champion	立法事务助理副部长（税收和预算）	国会议员幕僚
Alley Adcock	立法事务助理副部长（拨款和管理）	国会工作人员
David O'Brien	公共事务助理副部长（国内财政事务）	国会议员幕僚
Spencer Hurwitz	公共事务助理副部长（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工作）	国会议员幕僚
Alexandria Smith	社区和经济发展部助理副部长	国会议员幕僚
Sophie Delquie	公共事务高级顾问	国会议员幕僚
Tyler Badgley	副总法律顾问+财政部执行秘书	国会议员幕僚
Michael Faulkender	美国副财长（后已辞职）	首届政府官员
Brian Morrissey	总法律顾问	首届政府官员
Rodney E. Hood	OCC 第一副监理	首届政府官员

新提名的人员	职务	背景
Francis Brooke	国际贸易发展助理部长、财长顾问	首届政府官员
John York	管理事务助理部长	首届政府官员
Julia Hahn	公共事务助理部长	首届政府官员
John Hurley	主管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副部长	首届政府官员
Christopher Pilkerton	投资安全助理部长+副总法律顾问	首届政府官员
Jonathan Blum	立法事务首席助理部长（代助理部长职）	首届政府官员
Elliott Yoshio Hulse	公共事务部助理部长	首届政府官员
Tyler Williams	美国财长顾问	首届政府官员
Joseph Lavorgna	美国财长顾问	首届政府官员
Stephen Sandora	美国副财长顾问	首届政府官员
John Poulson	立法事务助理部长（负责国际事务）	首届政府官员
John Crews	主管金融机构政策的助理部长	首届政府官员
Jonathan McKernan	国内金融副部长	拜登政府官员
Jeffrey JR Gibbens	部长高级顾问	拜登政府官员
Zach Mollengarden	副执行秘书（负责国际事务）	拜登政府官员
Donald Korb	美国国税局首席法律顾问	资深政府背景
Cory Wilson	网络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办公室助理部长	资深政府背景
Ashtyn Landen	副执行秘书	政府从业背景
Jason De Sena Trennert	金融市场助理部长（后已自动退出）	华尔街背景
G. Hunter McMaster II	政策规划部主任（代金融市场助理部长职）	华尔街背景
Rachel Miller	执行秘书	华尔街背景
Shane Shannon	总法律顾问的顾问	华尔街背景
Gene Lange	美国财长顾问	华尔街背景
Ethan Fallang	资本市场的助理部长	华尔街背景
Kevin Salinger	财政部税务政策助理部长	华尔街背景
Rebecca Oakes Burch	国际税务事务助理部长	华尔街背景
Paras Malik	财政部顾问和首席人工智能官	华尔街背景

信息来源：美国财政部